

论周恩来的政治妥协思想

刘 丽

(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 要: 政治妥协是周恩来常用的一种斗争方法。妥协不是投降、不是软弱,更不是反动,它是一门政治艺术和政治策略,是一种社会调节机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可行性合作。周恩来的政治妥协有利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有助于行为规则的形成以及政治系统的稳定。

关键词: 周恩来; 政治妥协; 原则; 合作精神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9)06-0724-04

政治妥协是周恩来常用的一种斗争方法,妥协不是投降、不是软弱,更不是反动,它是一门政治艺术,是一种政治策略,是一种社会调节机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可行性合作。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采取了谈判、协商、妥协等多种方法,成功地处理了国内外多种冲突。本文主要基于政治哲学的视角,透视周恩来总理的政治妥协思想。

一、周恩来政治妥协思想的主要表现

妥协作为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其核心的含义就是折中、让步。让步从它内部结构而言,有忍让、具体问题妥协、策略妥协、个别原则妥协以及退避三舍这些内容。忍让是在明知道自己正确的前提下,无力说服对方,也无法通过民主方法贯彻自己的意见,为了维护全局的和谐、团结、统一,而放弃自己的意见。这种忍让,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太多了。

(一)具体问题上的妥协。具体问题妥协和策略妥协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的。如,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向全党客观分析了此次谈判中我方让步的必要性,因为不作让步,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谋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

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同时强调:“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1]100}在谈判进程中,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重庆曾多次致电中央,在哪些问题上坚持,在哪些问题上妥协。周恩来始终坚持了“双方让步”的立场。谈判之初,按照各自提出的谈判原则,双方的利益目标差距甚大。为打破僵局,周恩来在磋商中适时作出让步,表示只要国民党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那么中共就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双方在其他问题上都作出必要的让步。当经过努力和斗争,国民党代表接受了我党的和平建国方针以及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时,周恩来当即表示在军队数目和政权产生问题上,我方还可作相应的让步。通过这种双向互动,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周恩来提出这些妥协主张,纯属策略,目的在于使我党处于更加有理有利的地位。

(二)个别原则问题上的妥协。周恩来在个别原则问题上也曾妥协过。在迫不得已、个人无法扶大厦于即倾的时刻,放弃某一原则,才能坚持另一些原则。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

收稿日期: 2009-07-23

作者简介: 刘丽(1978-),女,江苏淮阴人,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把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一伙列入中央全会,而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周恩来在这时进行斗争无疑是毫无成果的。他放弃组织原则,坚持了更多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遇到了远比六届四中全会更复杂的局面。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林彪、江青这样的特殊人物斗争,不得不作适当的妥协和让步。“文化大革命”前期,对于解放干部的安排、革命委员会“三结合”人选的确定,周恩来都作了必要的让步,以换取形势的尽早稳定。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也作了必要的妥协。江青、张春桥等妄图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三个部门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经过与一些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教育部门关系重大,不能让他们掌握,否定了他们提名的人选。但文化部和体委两个部长职位让给了他们。这样,就排除了江青一伙的进一步干扰。整个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国务院的组成人选都由周恩来主持,按照与毛泽东商量过的意见基本上顺利进行^①。最终沉重地打击了由江青出面组阁,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此外,面对个人崇拜,周恩来对毛泽东违背组织原则的一些做法,如打倒刘少奇,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也只能违心同意了。其实,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周恩来斗争了,问题也解决不了,局面更困难,人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只有作一些妥协退让,才能坚持更多的原则。原则是多项的,周恩来没有放弃的是人民的事业,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周恩来放弃的,只是个别原则,并且这种放弃也是暂时的。而在条件允许,通过斗争能够力争达到的情况下,周恩来是最讲原则的。

(三)在国际斗争中的妥协。周恩来主张在国际斗争中有时要实行“退避三舍”的让步方式。1963年4月,他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2] 328}周恩来以美国侵略朝鲜和印度对我国进行挑衅为例证,说明我们运用退避三舍让步的必要性。此外,作为我党外交思想求同存异的倡导者,在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周恩来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当

机立断,临时决定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先用书面散发,并且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在下午的会上作了补充发言。他诚恳地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强调指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在亚非国家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他响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举例指出,中国代表团本来可以在会议上提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但是为了不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在中国代表团和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下,会议终于对议程中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订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使这次会议作为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二、周恩来政治妥协思想的实质

所谓妥协,就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一些冲突和争执。周恩来主张的政治妥协体现的是一种坚持原则、不丧失原则下的灵活性,是为了使自己取得更大的发展,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作出妥协。妥协作为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其核心含义就是折中、让步,即各方通过互让来寻求一致,从而消解对立,导致相互利益和满足的实现。其主要特征是:(1)容忍性,即矛盾各方都要放弃对抗,以合作、对话、让步的方式解决分歧和矛盾;(2)互利性,即矛盾各方都要将问题考虑全面,既考虑自己,也顾及对方,从而达到“双赢”;(3)务实性,即矛盾各方都要放下过往成见和意识形态,以追求整体最大利益为目标;(4)自愿性,即矛盾各方都要意识到让步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让步所带来的损失,从而自愿地进行让步。

周恩来善于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智慧中吸取营养,并根据他自己的实践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独特的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风格。他能攻能守,能进能退。这些经验他自己

总结过。1946年1月12日,他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报告,谈到国共会谈,他说了四点经验教训:“第一,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3]111-113}在1月18日政协会议发言时他又说:“政治解决就是相对容让、妥协。”^②共产党人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许多重大妥协,同时也换来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妥协。没有妥协,协商也就落空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认为,在我党面对一些特殊的政治矛盾时,作一定的政治妥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政治妥协意味着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政治妥协是有原则性的,政治妥协并不等于无原则的投降,不等于随波逐流和同流合污。恰恰相反,政治妥协是一种有利于大家共同发现真理、维护真理,有利于在政治多元化、多样化的基础上实现求同存异的一条现实可行的原则;是缓冲政治冲突的一种必要形式、手段和策略。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和“和而不流”。如果我们脱离了原则而言“和”,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不仅如此,政治妥协也不是消极被动地回避矛盾,不是无能、无为,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国家、政党、阶级或个人积极、主动面对矛盾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妥协实质上选择的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进取,它是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的有效机制。在政党外交中,周恩来坚持原则,捍卫原则,原则性极强。他说,我们“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原则是肯定的”。但如何坚持原则,周恩来有其独到的风格。他指出:“对原则问题要斩钉截铁,但又要灵活,不要咄咄逼人,要使人感到我们是诚恳的,是可以信任的。”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原则是前提,“是不能让的”;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以求达到成功”^[4]。

(二)政治妥协意味着把暂时的局部的利益牺牲与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获取统一起来。从时间角度考虑,当各方眼下无力解决一些政治矛盾和冲突,或者冲突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复杂过程时,各方都具有团结积蓄己方力量的需要,这时候,最佳的策略就是通过政治妥协争取时间,等待时机,以便积蓄力量获取长远的发展。从空间角度考虑,各方为了谋求更大的目

的和全局利益,也会在局部利益和阶段目标上作一定的政治妥协,这时候,以曲求伸、欲取先予、迂回实现目的也是一种政治智慧。例如,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自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因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在大会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

三、周恩来政治妥协思想的时代价值

随着协商民主和契约文明观念的广泛传播,“妥协”不仅越来越具有手段合理性,还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价值正当性。用协商谋求共识,用契约调整利益,在这种普遍的制度规则中,愿意妥协作为一种前提使得协商得以展开;接受妥协的结果,则使契约能够践行。周恩来经过长期探索、实践,终于找到了政治的灵魂——学会妥协。周恩来之所以能熟练处理政治冲突与政治妥协的关系,在于其政治妥协思想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周恩来的政治妥协增强了共产党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益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也有益于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实现。因此,周恩来政治妥协思想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政治妥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和

冲突,从而可以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趋利避害是政治行为主体最为典型的行为方式,当自身最大利益的实现受到对方利益需求的制约时,如果做出决不妥协的对抗方式的行为选择,最终结果将是两败俱伤,与其一无所有,不如退而求其次,求得双方都可接受的利益均衡。因此,政治妥协并不欲求政治行为主体各方最大利益的实现,而是避免各方最大损害的出现。在此过程中,政治妥协蕴含着一种“求和”的精神,即和平、和谐进而促成合作,这是政治妥协的根本价值所在。妥协精神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现实政治生活存在着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可能性很小,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在妥协的原则下和平共处,矛盾的解决无需依靠暴力方式,通过思想的宽容和理性的说服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但是,和平的合作总是建立在政治主体行为互动的基础之上,是对对方的尊重和对合作利益的追求,任何一方都不能试图以完全剥夺对方的利益为行为目标,否则,便失去了政治妥协的前提。

第二,政治妥协有助于行为规则的形成,从而提高政治系统的制度化水平。规则对于人类政治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规则的理由就存在于人们永无休止追求和平与和谐的共同生活的愿望之中;在这种生活中不存在持续不断的入人为敌的霍布斯式战争”^[5]。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获得稳定性,特别是当规则具有了外在的强制力,并得到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承认和遵守时,它便为政治系统中参与各方确立了基本规范,从而在多元的政治格局中提供一种和解的基础。当规则不断起到对政治行为主体的约束作用、日渐获得稳定性并受到尊重直至成为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时,规则便演化成了政治系统的制度。由于制度的建立是在政治妥协的互动过程中孕育完成的,因此它并不代表着某些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它能够有效吸纳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被动员起来的新兴政治力量,成为化解冲突的基本安排,于是政治系统便获得了自主性和凝聚性。与此同时,持续不断的政治妥协和制度的自我强化,可以使政治系统得以生存和延续,因此也就具备了适应性和复杂性。当政治系统拥有了这样的特性时,它便具有了比较高的制度化水平^③。

第三,政治妥协培养合作精神,从而维系政治系统的稳定。政治妥协是就政治行为主体所认可的普遍利益所达成的规范,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如果规范体现了普遍利益,那么,它们就以一种理性的共识为基础。”^[6]而理性的共识体现的是一种合作精神,因此,没有政治妥协也就没有合作。合作精神在两个向度上影响着政治主体的行为,一方面是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合作体现的是理性主义的认同和共识,或更为具体一些应当是“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认同和共识;另一方面是在行为取向上,合作精神鼓励政治行为主体有序地政治参与。政治妥协意味着政治行为主体的相互认同与合作,当政治行为主体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对方的尊重并且可以通过既定的制度框架加以表达实现合作时,他们便获得了一种遵从现有规则的激励,也更愿以合法有序的方式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从而使现存的政治系统处于连续与有序的状态,实现政治稳定。

注 释:

- ① 参见《最后的使命——周恩来与四届人大》,载《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② 1949 年 1 月 19 日《新华日报》。
- ③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 版,第 12-23 页。

参考文献:

- [1] 胡长明. 大智周恩来[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 [2]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 [3]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 [4] 詹世亮. 周恩来总理是外交学中国化的奠基人[J]. 国际观察, 2009(1).
- [5] 布伦南, 布坎南. 宪政经济学·规则的理由[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前言.
-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48.

责任编辑:张 超

ABSTRACT

The Time Content of the Mass Line in the Context of Democrac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LIU Jing-zhao
(Mao Zedong Thought Research Center,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arty's mass line still was the important thought resources. However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unless it must be given new time content in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the mass line can highlight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he new content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Establishes the people's position of subjectivity in democratic politics; Emphasize the people's checks and balances effect to government power; Mainta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people's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Transform the mass movement into public's positive political approval in order to impel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mass line; democrac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power; political approval

The Policy System and Safeguard Mechanism Research of Two-oriented Socie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Ecology Civilized Sight

TIAN Wen-fu

(Teaching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CPC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y civilization has contained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s and the requests of a resource 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ociety, thus Two-oriented Society construction needs to examin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under the visual fiel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peed up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harmon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Key words ecology civilization; Two-oriented Society; policy system; safeguard mechanism;

On Zhou Enlai's Political Compromise

LIU Li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yan, Jiang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compromise is a struggling method commonly used by Zhou Enlai. A compromise is not a capitulation, not weakness, nor reactionary. It is a political art and political strategy and a social adjustment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he feasibility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based on democracy. Zhou Enlai's political compromise is conducive to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nd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principles as well as political system stability.

Key words Zhou Enlai; political compromise; principle; cooperation spirit

Science and Culture and the Subjectivity Sepa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pistemology

DING Sh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as brought enormous benefits to human, but it shows the problem of subjectivity sepa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production, thus a number of drawbacks inevitably appear. How can we make science and culture have the necessary human nature? How to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be possessed with the indispensable humanism? There are many approaches to explore the issue from the theory of epistemology. Though they are not perhaps clear-cu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is useful exploration can give us an inspirat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Key words social epistemology; political positioning; subjectivity dele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Wei Jin's Celestial Taoism

—Focusing on Baopuzi Inner Chapters

LIU Li-fu, ZHOU Ya-d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elestial Taoism, theoretically founded by Ge Hong, was the unique form of Taoism during Wei Jin dynasties. In Baopuzi Inner Chapters, Ge Hong discussed comprehensivel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which provided us a basic clue to the Taoists'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fucianism. Although Ge Hong tried to prove that Taoism was superior to Confucianism, he combined the religious faith of longevity or immortality of Taoism with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Confucianism. And this theory mad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aoist reforms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the Celestial Taoism; Ge Hong; Baopuzi Inner Chapt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ism and Confucianism